

# 李大钊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解喻说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1919年,李大钊开始宣传唯物史观,此后在他探索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用到历史解喻的提法。他把历史解喻看成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重要任务,同时,他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喻方法。充分理解李大钊历史解喻说的意义和方法,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李大钊;史学要论;历史解喻;史学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4-0015-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4.003

##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Li Dazhao's Thought on Historiography

ZOU Zhao-che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began to publiciz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1919. During the following years, he tried to apply this outlook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where he usually adopted the idea of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e regarded this as an important link and task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also proposed the specific method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method of Li Dazhao's idea on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s very enlightening to construct historiographic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m.

**Key Words:** Li Dazhao; *Key Opinions on Historiography*;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discourse system

一百年前,李大钊开始在中国宣传唯物史观,把它作为一个能够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新历史观。随后,他开始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领域,试图把这种新历史观作为解释人类历史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运用,在李大钊那里被称为历史解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界对李大钊研究的逐步深入,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也受到很多学

者的关注和逐步深入的研究。其中,李大钊对于历史解喻的论述也同样受到学者的重视。张文生在他的《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的第六章论述李大钊的历史认识论问题时,曾有一节从历史认识的形成及其深化的角度谈及李大钊的“解喻”和“改作”,这一论述角度及观点对于深入了解李大钊的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在

**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探讨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时,不能不想到当年李大钊曾经论述过的一些问题,从而对我们能有新的启发。

## 一、历史解喻说的形成

李大钊自 1919 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来,就开始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历史问题。1920 年 1 月 1 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文章中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sup>[1]143</sup>这表明他开始试图运用新的历史观来说明历史的变迁。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经济的历史观,经济的变化属于经济基础,而近代思想的变化属于上层建筑。用经济基础的变化说明近代思想的变化,就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方法。这里,李大钊所谈的“解释解释”,就是一种运用新历史观对历史的一种分析和说明,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史学把历史的研究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的范围。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表明李大钊开始具有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初步趋向,但他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种新史观就是唯物史观。1920 年 12 月,而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他明确宣称这种新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并且对需要用新史观解释历史的必要性作了更充分的说明。

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的诞生给了历史学家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历史学家们真正研究历史原因问题的人很少。那时的历史学家的“职分”,主要是搜集和阐述政治上或外交上的事实,特别要阐述那些伟人或“时代天才”的活动。他们以各种历史观来对历史进行解释,包括政治的解释、宗教的解释等,很多的历史解释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于历史的解释达到了“唯心的解释的极点”,让人感到“过于暧昧”“过于空

虚”。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人在社会上历史,也就是社会生活史。人类的历史,应该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泛的社会活动。政治的历史,只是这广泛的活动中的一个方面。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全新的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篇文章中“解释”一词的使用率特别高,总共出现了 16 次之多,可见李大钊对历史解释问题的重视,是他的历史解喻说的雏形。

从 1923 年 9 月到 1924 年上半年,正是李大钊撰写史学思想史讲义并授课的期间。他这时候的文章,更加强调历史观就是一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所不同的是,他开始把对历史的“解释”的意思称为历史的“解喻”,有时也和“解释”混用。例如,在《史观》一文中,他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那么,历史观是做什么的呢?他说: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sup>[1]254</sup>

在史学思想史的一系列文章中,李大钊对“解喻”和“解释”两个词是同时使用的。如:在《鲍丹的历史思想》中,他说十六世纪的法国“名家辈出,类皆穷思殚虑,以政治与社会为研治的主题,然解喻之明,探索之深,预见之验,未有如鲍氏者也”。文中他还提到有一种与神性有关的精神,“此等原则,是人所能解喻的,或者有人想没有在人类史中寻求是等原则的必要,因为此等原则乃在神明史中最容易直接的为人所解喻者,但此说非是”<sup>[1]272</sup>。

1923年12月11日李大钊在《〈清代通史〉序》这篇短文中，两次提到历史的解喻，把它看成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他说：“夫历史既为延续永存生动无已者，则其迁流于健行不息之时间，新陈代嬗，兴衰迭现，绝无一瞬间停歇；则吾人关于史实之搜求、记录、解喻、说明之业，亦当精勤弗怠，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而无一瞬间停歇，俾史料少所散佚，史观益趋正确。”<sup>[1]373</sup>在此文中，李大钊还强调：“史料之产生愈益繁富，史实之解喻愈益正确，所以一切史书皆不惟重作，且必须重作。”说明了解喻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1924年5月，李大钊为商务印书馆撰写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史学要论》出版，书中明确地阐明了他的关于历史解喻的系列说法。他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前者比较的变动少，后者则时时变动。解喻是对于事实的知识，知识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sup>[1]403</sup>

这段话是李大钊关于历史的解喻问题的核心论述。除此，在《史学要论》的第一章“什么是历史”中，他还有几处谈到了历史的解喻。这样，在这一章中总共有10次之多，可见这不是他随意提到的一种说法。因为在李大钊看来，历史的解喻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是史学家追求历史真实这种目的的重要手段。研究历史或者了解历史，离不开搜集史料，同时也离不开历史解喻。

## 二、历史解喻的内涵及其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历史解喻说，是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表述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解喻”的概念应该说与“解释”没有太大的区别。李大钊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改用“解喻”。但我个人理解，“解喻”不仅具有解释的意思，还有晓喻、告知的意思，比如家喻户晓。《礼记·学记》中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史学家就应该像老师一样，不仅能够分析解释史料，还要善于把分析解释的成果告知别人。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历史的解喻究竟有怎样的重要性呢？李大钊认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要想让今天的人们了解过去，光靠有关过去的书籍和各种资料等死的东西是不够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必须有史学家的参与，发挥史学家的作用，让他们来解释、说明历史。因为：

第一，只有史料不能真正达到了解历史的目的，只有经过历史学家的“解喻”，才能让人们真正了解历史。

大家知道，李大钊在《史学要论》的开卷语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论述，半个世纪以来不断被各种史学概论等著作征引。他说：

吾人自来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 Herodotus、Grote 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sup>[1]399</sup>

李大钊这些话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要区别死的历史和活的历史,或者说要区别历史的纪录和真实的历史。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典籍,都是属于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的材料,我们“必须要广蒐,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历史资料,可以说是活的历史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就是说,那活的历史存在于这些“陈编故纸”之外,有它的永续的生命。正像我们看到一本中国史或日本史的著作、一本关于列宁或罗素的传记,不能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日本、这就是列宁、这就是罗素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些著作之外,还有一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而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在于透过这些史料,让人们看到这活的中国、活的日本、活的列宁、活的罗素。用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要“另找真实的历史,生活的历史”。

李大钊认为,这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纪的历史,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历史事实本身,却是“永远生动无已”,纪入纪录的那些历史事实是没有终结的。“不但那全个的历史正在那里生动,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实亦天天在那里翻新。”所以,要掌握那真正的活的历史就要通过对历史的解喻。就是说,只有通过历史的解喻,才能把史料上对历史的记载变成“历史的事实”。正如他所说:“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sup>[1]403</sup>真实的历史,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虽然有一些历史的纪录,但也是无法让历史再现的。所以,今天只能通过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喻,才能在今人面前再现那已经逝去的历史。

第二,历史的解喻是不断发展的,经常变动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历史发现的愈益全面,对历史的解喻可以愈益真切。

李大钊认为,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二层意义:一是说对于过去的事实在纪录是正确的,一是

说关于过去的事实在解喻是正确的。解喻是对于事实的知识,知识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过去的事情消亡了,但过去的事情保藏于我们的记忆中,“吾人保藏之愈益恒久,即发见之愈益完全,即解喻之愈益真切”<sup>[1]403</sup>。比如,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活现于人们的想象中,潜藏于人们的记忆中。所以,解喻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历史的解喻可以更接近于历史本身。

第三,通过历史解喻的不断进行,史学得以发展,史学研究水平可以得到提高。

李大钊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sup>[1]404</sup>

李大钊以中国历史为例分析了由于人们历史知识和历史解喻的进步对于历史学所产生的影响。比如,从前的史书,都认为火的使用、农业及农器的发明、衣服的制作等,都是半神的圣人,如燧人氏、神农氏等的功德;都认为黄、虞时代,为黄金时代。但是通过进化论的传入和进步的历史观的产生,人们开始认为这些重大的发现是人类生活一点一点进步的结果。不知经过了多少世纪,经多少人有意无意中积累的发现与应用的。由于有了这样进步的历史观和知识,必然会推动历史家们重写这远古的历史。“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sup>[1]404</sup>“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他同他的前途发展的愈长,他的过去的真实为人们所认识的,愈益明确。”<sup>[1]405</sup>这就是说,历史观的进步,历史知识的增长,会促进历史解喻的发展,从而成为历史学

前进的重要动力。

第四，历史解喻能力的高下是衡量史学著作水平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论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sup>[1]217</sup>

李大钊曾经把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希腊史》和19世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所著的12卷本《希腊史》进行比较，认为格罗特的《希腊史》比希罗多德的《希腊史》“真确的多”。这不是格罗特的天才比希罗多德的天才高，亦不是希罗多德比格罗特爱说谎，“时代所限，无可如何”。由此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解喻至关重要，历史解喻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部史学著作水准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 三、如何进行历史解喻

李大钊的历史解喻说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指导意义。他主张：

第一，选择正确的历史观作为历史解喻的基础。

在李大钊看来，在史学研究中人们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历史解喻，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观的不同。进化论的历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修正了神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之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这样遂把历史学提到了科学的地位。他强调，马克思给了当代学者一个完整的新历史观。“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sup>[1]402</sup>

对于史学家来说应不应该有一个历史观，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或许认为史学家应该虚怀若谷，冷静地观察史实，不应该预存一个

先入为主的历史观。李大钊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若一个治史者没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作为他治史的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然会“治丝益棼，茫无头绪”。他说，无论何人，总会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他的历史观在那里存在，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防止那种“过于偏执的或误谬的历史观就是了”。总之，在李大钊看来进行历史解喻，离不开正确的历史观，离不开相关的哲学。

第二，进行历史解喻需要进行认识论的考察，确认对于历史考察的结果能够达到某种程度。

李大钊的历史解喻说，有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认为历史解喻要首先根据认识论的一般考察，了解历史考察的对象，“宜先根据认识论上一般的考察，精察其何者为人智所终不能知，何者可试为推论思议到如何的程度。于其终非人智所及知者，则说明其所以不能为人智所及知的理，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于其可试为推论思议到某种程度者，则进而为推论思议至于其所能几的程度”<sup>[1]441</sup>。这反映李大钊对于历史的解喻完全是持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解喻不是万能的，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对于历史领域还有一些未知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历史的解喻无法进行的。历史的解喻，只能在人类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来进行，这是历史解喻的前提条件。

第三，要运用研究历史事物的特殊方法：历史的考察法。

李大钊认为，一般人说史学的研究就把它理解为沿革的研究，“述事物的来历，明其变迁沿革的经过”，也就是“历史的”事情。李大钊说，这种“历史的”“把他当作学术上的用语，就是表明一种考察事物的观察法。这种观察法，专寻事物的起源及过去的变迁、沿革。简单说，于生成发展的关系考察事物，答怎样成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历史的考察法”<sup>[1]407</sup>。所以，我们今天谈论历史学的性质，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要考察这些属于“历史的”事情。当然，这种历史的考察法不单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

对于自然现象也是适用的,比如研究地球的发展,生物的由来,也是可以运用这种历史考察法的,但是这些已经超越了史学的范围。所以李大钊认为,史学是专门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的,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变革及其社会生活变革产物——文化的学问。

第四,要和其他学科一样运用一般的逻辑方法,进行演绎的、推理的研究。

为什么要用这种一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呢?在李大钊看来,史学原本是以组成人类经历的各种事实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考察各种特殊的历史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确实是史学的“重要职分”,也可以说是“史学家的要务”。但是,史学家不能认为对个别历史事实的确定、整理、记述就是他的全部任务,史学家“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就是说,史学家的任务有两层:第一层是就单个的历史事实在本身进行解释、说明;第二层是汇集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作一般的解释,而明普遍的理法。第二层正是“史学家的要务”。这就是说,史学不但应该就特殊事例进行推理的考察,而且也要进行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从第一层来说,史学的方法与其他科学的方法不同,它是一种特别的学问;从第二层来说,史学是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史学才可以算作一种科学。李大钊在总结史学的要义时指明:“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sup>[1]411</sup>这表明,这种科学的方法的采用,使史学的研究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是历史解喻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第五,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验证历史研究的结果。

李大钊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除了要进行记述性的历史研究之外,还需要进行理论性的研究。“科学不是能一朝一夕之间即能完成

他的系统的。”有了特殊事实的研究结果,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同时又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方能作到好处。”<sup>[1]413</sup>

在《史学要论》第五章中,他谈及与史学有较近关系的学问,大体分为六类,共二十三种。其中,他谈的较多的是哲学、文学和社会学。比如,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以研究人类社会为对象,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sup>[1]442</sup>因此,两者有“相资相倚”的关系,需要相互借鉴。

第六,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于各个历史事实的综合建构还是研究结果的文字表述,都要具有艺术的性质。

李大钊认为,史学研究由各个基本事实的确定,进一步又要对其进行综合,而当史学家把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的时候,如何把这个一个单独的事实进行适宜的“结配”,从而把历史事实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生生地描绘出来,“组之,成之,再现之”,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学就体现出到某种程度其研究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他说,不仅仅是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也含有艺术的性质。他认为,其他科学,不仅是史学,即使是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在它们进行这种工夫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同样含有艺术性质。这是对历史解喻的境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历史解喻的成果,最终是要让人看的,如果这种结果完全缺乏“艺术的性质”,使人完全不能理解,那就不是高水平的历史解喻。

#### 四、李大钊的历史解喻说对构建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启示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问题,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近年来，已有学者谈到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如瞿林东认为，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他认为：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关于研究对象的解释以及语言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他主张：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则应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将其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际基础，也是显示历史学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重要路径<sup>[2]</sup>。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出版于1924年，至今已有九十年的时光，那是20世纪新史学尚在初创时期的一本几万字的小册子，在21世纪中国史学已经蓬勃发展的今天，它对我们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呢？

第一，李大钊明确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

在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中国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在初级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成果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没有问世，李大钊就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指导思想，并试图用它来阐释历史。他在1920年所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

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都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有了这几年探索的体会，所以他在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才能明确地说：“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因为他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革，能够发现历史的规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当年，李大钊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考察社会历史问题具有这样强的自信力是非常不容易的。重温一下李大钊当年的论述，不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初心”，对于增强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理论自信”是有益的。

第二，李大钊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他立足于中国，而从西方学术思想发展史中广泛吸收新思想的营养，用来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从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视野主要在西方的哲学思想史、史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是较深的，在他的文章中涉及到的西方学者的名字、著作和思想观点是非常广泛的，这也说明为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提供参考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有些是他赞同的，有些是他摒弃的。

目前，学术界在建立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的讨论中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当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必须以中国史学的遗产为基础，认为中国史学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遗产非常丰富，不需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就可以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史学话语体系；另一种倾向认为中国传统史学遗留的理念、方法是很少的，是非常保守的，只有引进国外的新理念才能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李大钊对中外史学思想的开放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的专业特长是讲述西方史学思想史，但他力图“洋为中用”，借鉴西方史学的新理念，构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他也没有贬低传统史学遗产的价值，在他的一些历史研究文章中也借鉴了传统史学的方法。

（下转第25页）

大钊烈士数事》)。

李大钊遇难后，吴弱男曾当即赶赴李宅慰问遗孤，知悉其家所余家用仅有银元一枚后，随即出面集李大钊生前友好，商拟筹集赙金，经多方奔走很快集得二千多元，除支付棺木葬仪等支出近千元外，余存一千余元，委托李大钊生前友好白眉初、陶玄等人组成管理小组，以息金维持遗族生计。吴弱男出面为李大钊后事集金及办理葬仪，其幕后自有当时不便公开露面的章士钊出谋划策，因此，当时中日报界记者在报道有关详情时，用语多为“昨仅章士钊夫人及中日报记者数人往慰李夫人”，或“前总长夫人出面为李大钊料理葬事”等，总之，是不肯忽略章士钊的关注与作用，从而更加彰显出了章士钊与李大钊的交谊，“岂寻常风义所可限哉”！

1950年夏，北京大学师生为学习、纪念革命先烈李大钊，将红楼内原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辟设为“李大钊同志纪念堂”，以百余帧图片及相关资料公开陈列了李大钊生平及光辉事迹，供广大师生观览。章士钊亦曾往观，并于观览之后，题诗一首，诗曰：“隙尘何微微，朝夕通

(上接第21页)

第三，李大钊的历史解喻说具有系统性的特点。

他的解喻说不是在他的著作中的个别地方偶尔提及的，而是反复提及、反复阐述的。他的历史解喻说不仅包括历史观的内涵而且涉及认识论的基础，在方法论上也提出很多明确的、可行的途径。尤为可贵的是，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成果的构成和文字的表述都要有艺术的特征。这样一个明显具有系统性特点的思想理念，对于构建当代史学的话语体系无疑是值得参考的。

李大钊史学理念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他所说的“史学的幼稚”问题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用新的理念和方法解喻历史，使历史研究真正达到科学的高度依然有待努力。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等著述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研读，正是在于他没有那种经验主义倾向，即偏重于总结史学界

其辉。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青林有蝉响，赤日无鸟飞。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上款题“守常老兄”，下款书名“士钊”。诗幅陈列之后，观者认为此是章士钊挥泪手书的思念老友的真情之作。

不宁唯是，即在李大钊逝世二十五年后的某日，当章士钊再次追忆起他与李大钊的交谊时，曾谓：“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sup>[1]</sup>对于章士钊的这一忆述，闻者皆以为是十分确当的。正所谓：挚情可鉴，俨如清塘。

#### 参考文献：

- [1] 章士钊. 李大钊先生传·序言[M]//张次溪. 李大钊先生传. 北京:北京宣文书店, 1951.
- [2] 蔡元培. 蔡元培书信集[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 [3] 章士钊. 章士钊全集:第7卷[M]. 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李秀荣)

过去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试图给人们从事史学研究以路径上的指引。而李大钊则突破了传统的框架，吸收了当时中外学术思想的最新成果，指出了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而必须遵循的途径。他的思想的高度在当时是无人能企及的，即使在今天他学术思想中的一些亮点也常常为人们所称道。因此，李大钊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那些历史解喻的理念和方法对于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时仍然具有很多重要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2] 瞿林东.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2): 21-27.

(责任编辑:李秀荣)